

行动与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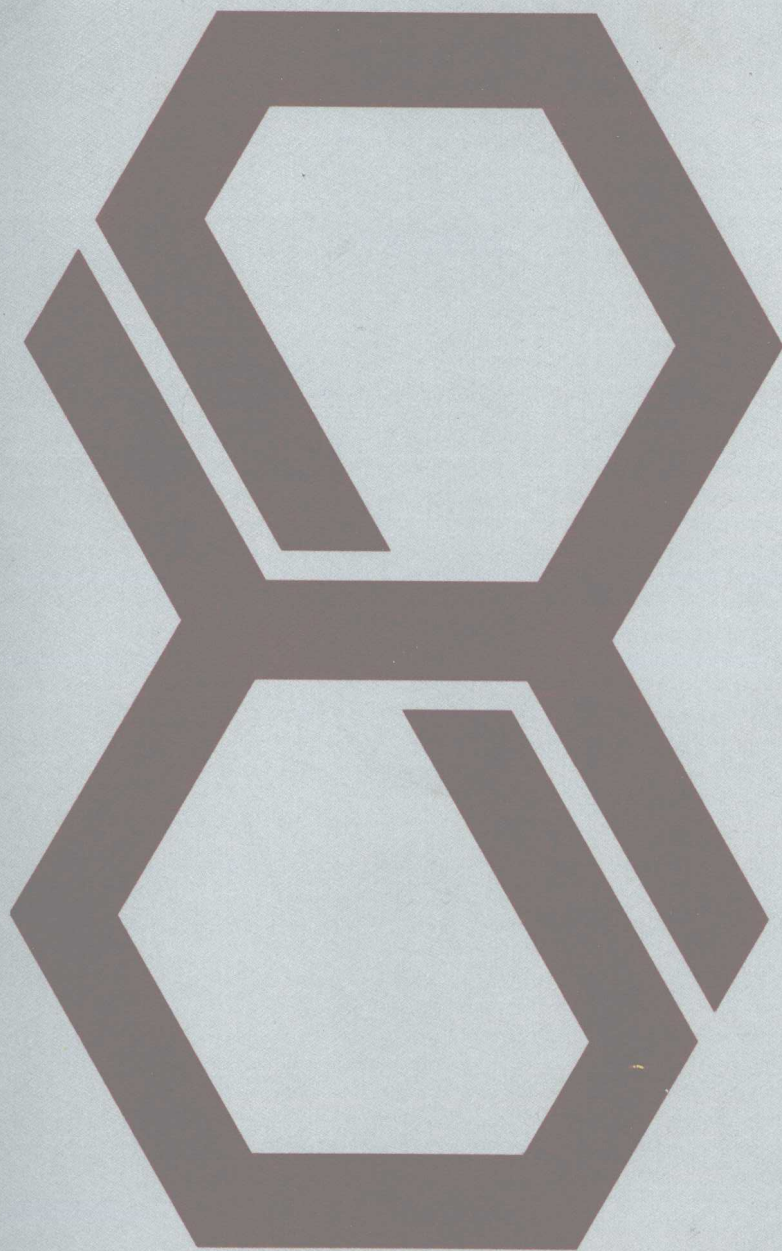
孙冀 著



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



万卷出版公司





國際交流基金

行动与思维：

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

孙 冀 /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孙冀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行动与思维: 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孙冀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10

ISBN 978-7-80759-423-9

I. 行… II. 孙… III. 日本—对外政策—亚洲—研究
IV. D8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1394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220千字

印 张: 9.25

出版时间: 2008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装帧设计: 刘萍萍

责任校对: 王 斌

版式设计: 万晓春

ISBN 978-7-80759-423-9

定 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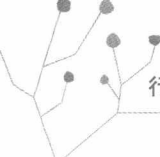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001
第一节 综述	001
第二节 1980 年代的日本亚洲外交	011
第三节 1990 年代前半期日本的亚洲外交	025
第四节 1990 年代后半期日本的亚洲外交	038
第五节 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的日本亚洲外交	044
第二章 1980 年代日本亚洲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062
第一节 战后日本外交历史的回顾	062
第二节 1980 年代日本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074
第三节 1980 年代日本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	081
第四节 1980 年代日本的美国外交思维与行动	088
第三章 1990 年代上半期日本亚洲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091
第一节 导论	091
第二节 第一次海湾战争对日本外交思维与行动的 影响	093
第三节 冷战结束对日本的俄罗斯外交思维与行动 的影响	096
第四节 东亚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形势	103
第五节 朝鲜半岛在日本亚洲外交当中重要性的提高	108



第六节	日美安全同盟的再确认和再定义	111
第七节	日本外交思维与行动的过渡时期	113
第八节	拒绝对历史罪错的赔偿	116
第四章	1990年代下半期日本亚洲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119
第一节	1990年代下半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国际环境	119
第二节	桥本龙太郎时期日本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	125
第三节	小渊惠三时期日本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	138
第四节	森喜朗首相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	147
第五章	小泉纯一郎时期日本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	151
第一节	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	151
第二节	小泉纯一郎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165
第六章	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176
第一节	问题迭出的日中关系	176
第二节	日本的对华外交思维与行动越来越自行其是	182
第三节	1972体系面临挑战	189
第七章	日本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思维与行动	198
第八章	日本对韩国的外交思维与行动	206
第一节	战后日韩关系的发展历史	206
第二节	1965—1979时期日本对韩外交思维与行动	209
第三节	1980年代日本对韩外交思维与行动	211

第四节	1990—1997 时期日本对韩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213
第五节	1997—2002 期间日本对韩外交思维与行动	217
第六节	2002 年之后的日本对韩外交思维与行动	222
第九章	日本对俄罗斯的外交思维与行动	226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日苏关系	226
第二节	叶利钦时期的日俄关系	229
第三节	普京时期日本对俄罗斯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238
第十章	日本对中亚地区的外交思维与行动	243
第十一章	日本区域主义外交的思维与行动	251
第一节	日本区域主义外交思维与行动概述	251
第二节	1980 年代日本区域主义的思维与行动	257
第三节	1990 年代以来日本区域主义的思维与行动	260
第四节	日本区域主义地区结构的思维与行动	263
第十二章	总结：正义、法律和历史主义	270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综述

作为一个东北亚国家，在其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千年中，日本直接地受到两个国家的影响：中国与朝鲜。在过去的 150 年中，日本外交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西方与近邻之间的关系。西方代表着遥远、现代化与权力，而近邻代表着历史与地理上的亲近和国际政治上的落后和无力。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挑战和这种挑战所引致的日本外交两难困境又增加了新的苦涩与辛酸的成份，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与“近邻”之间的权力差别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日本处于全球权力平衡格局中利益与影响的决定主体的地位，而且在日益兴起和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区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地兴起和发展，日本也是这一进程或状态中的利益与影响的决定性主体。对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思维与行动进行分析就是要评估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统合于日本的亚洲邻国政策关系，以及随着亚洲近邻国家的变革进程，这种西方与近邻之间的关系和相应的政策如何能够符合日本国内的需求和日本的国家利益。本书的论述与研究意在检视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是如何在思维和行动两个层面认识和处理日本的亚洲外交，尤其是日本的东北亚外交的。本书的

论述与研究确认了关于日本外交战略思维的标准，评估这些标准在评估四个时期日本亚洲战略状况的适用程度（这四个时期分别是 1980 年代、1990 年代前期、1990 年代后期，及小泉纯一郎首相任期时期。）其中国别分析的重点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中亚等国家，以及经济区域主义视野下的东南亚地区与东亚地区。

在对日本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进行论述和分析的时候，避免特定的国际关系偏好框架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和必要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日本积极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具体地意味着日本同美国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和联系；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日本积极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则意味着日本同美国的关系与日本同亚洲近邻的关系之间的平衡。本书论述和分析的标准和原则超脱了这种二分法。这里对日本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的评估标准是：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了使日本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和更加可敬这样一种终极目的和目标。同时，对日本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的评估标准还将包括：它在多大的程度上为日本的公众提供外交上的确保而不是外交层面的“警醒”、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在解决已被确认的问题而不是拖延和恶化那些已经被确认的问题、在多大的程度上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一种通过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有效沟通与共识而精心组织谋划和非常到位的过程。这些标准所重视和强调的是：长期目标的追求；对两种趋势的平衡，一种是由于日本在赢得更大程度和范围的国际信任而形成的日本国际影响的增大，另一种是由于对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的需求而形成的对过度国际依赖的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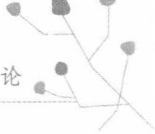
这里注意到对于日本亚洲政策经常重复发生的一些首选议

题，对于这些首选议题的追求提供了对日本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进行评估的基础。第一，存在一种平衡或限制那些被认为是崛起的或对日本的国际抱负具有竞争性的国家的外交目标。在 1980 年代，苏联依然是最大的关切。在 1990 年代前期，日本领导人似乎更加关注和致力于在亚洲与美国的平起平坐。后来，崛起的中国成为日本在这一方面上关注的焦点和对象。第二，日本人一直执着于追求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亚洲国际地位中的合理化和合法化的目标，消除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和一个被谴责亚洲大国的非常态历史遗产。中国、韩国和朝鲜是日本这种战略外交努力的直接对象。第三，日本的外交一直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设身处地地予以考虑和处理，这两个地区是日本列岛国际通路的基本门户，对于日本的国际利益关系具有实质而根本的影响。第四，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式，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一直寻求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这里对日本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以上四个首选的目标议题在作为外交思维与行为的时候，就构想和实施这两个层面做得究竟有多成功。

日本从战后亚洲国际状态中羞辱与被动的历史中的走出与崛起实际上是近 25 年来的事情。开始于中曾根康弘首相的五年总理任期（1982 年—1987 年），到小泉纯一郎总理的卸任（2006 年）。在此其间，这两位日本总理都致力于深化日本同美国的联盟关系，同时也都致力于在亚洲投放“一个繁荣和和平的日本”的形象。中曾根康弘首相努力使日本外交终止缺乏生气和自信的状态，他认为作为一个战败大国在外交上的沉默、无力和软弱是同日本超级经济大国的实力非常不相称的。而小泉纯一郎首相则努力遏制

日本在亚洲被边缘化的趋势，一再地公开拒绝对其关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和行为的批评，声称他的有关态度和行为是日本国内的问题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尽管他们两人在处理亚洲邻国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在拓展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地位方面却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如何独立于美国而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呐喊，同时准备有所突破和建树；如何同中国和韩国进行妥协协作以建立在亚洲地区坚实的立脚点；如何以坚定的姿态处理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问题，处理同朝鲜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新的战略平衡；如何处理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以形成一个具有潜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向的日本经济的腹地。

在他的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中曾根康弘首相面临着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剧烈变革，这种美苏关系的剧烈变革在提供新的外交机遇可能性的同时也对曾经长期存在的日本外交前提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在他担当首相的前期，冷战格局与状态的重化使日本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和突出，而此后随着冷战格局和状态的缓和与改变，日本国际战略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于是日本的外交思维与行动就随着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样地，小泉纯一郎首相也面临着类似的国际战略格局与状态的实质性变化。在2005年9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赢得胜利之后，小泉纯一郎首相面临日本的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上的新的局面与挑战。在与美国布什总统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的同时，小泉纯一郎首相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亚洲局势：美国全方位介入朝鲜国际安全影响的战略；美国与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之间日益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朝鲜核危机的不断深化；在一波三折的六方会谈中，日本在安全问题上似乎只有同美国可以有一致



性的看法和立场；日本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政治互信越来越少；ASEAN+3 会议机制和东亚高峰会议机制（EAS）中日益出现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不一致的观点。在这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下，小泉纯一郎首相的外交行为总体上具有这样的特点：在营造更加紧密的日本与美国关系的同时，竭尽全力地制定和实施应对急剧变化的亚洲国际环境的亚洲外交战略。

在从中曾根康弘首相到小泉纯一郎首相的 14 年中，日本外交一直在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落脚点的状态中迅速地变化和摇摆，并且在这种变化和摇摆的过程中进行着艰难的摸索和探求。这种状态可以划分为三个分别具有明显特征和内容的时期。第一个时期，自民党的几个任期较短的首相对中曾根康弘首相的外交战略过于自信和因循，因而没有能够对冷战的结束和亚洲格局的重组做出充分迅速的反应。第二个时期，在国内政治出现了多党合作和中央政府权威弱化的情势中，自民党缺乏充分的政治力量构想和实施有效的外交战略，同时也没有能够替代自民党作为外交战略构想中心的其他组织或机构，因而在这种情势中的日本的亚洲外交内在缺乏战略规划，日本的亚洲外交就必然地表现为战略脆弱。第三个时期，在自民党重新获得了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力之后，实际的状态是他们实行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是战略务实主义的政策。同中曾根康弘总理“谨慎的坚持”（cautious assertiveness）亚洲外交政策形成对照的是，这三个时期客观上形成了相互之间不一致的外交历史记录，出现了非常具有创意和崭新前景的构想，同时也坐失了很多宝贵的机遇。小泉纯一郎首相的亚洲外交遗产是：同美国越走越近，而同亚洲渐行渐远；起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情绪上是这个样子。这种日本外交的状态具有明显的弱点

和务实主义的特征，而在此之后日本在亚洲外交方面如何平衡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则是一个向各种可能性都开放的状态，是进一步深化这种外交框架，还是进行某种平衡？现在还很难判断。

尽管这里的焦点在于日本的东北亚外交战略思维，但是在这个背景下还有三个导向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是国家身份意识（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问题。这是所有的日本外交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由于二战失败的原因，日本的国家身份意识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这个问题同对东北亚国家的认识和日本同东北亚国家历史关系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毕竟，这些国家是通过历史的镜子来看待和认识日本的；而在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历史意义的自我寻求和解读的过程中，日本不可避免地同这些国家的相关认识发生碰撞。当然，日本的国家身份问题也不仅仅同日本在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情结相联系。成为“正常国家”的诉求同时也意味着要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加全面的责任，其中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反对恐怖主义的责任。从日本的角度看来，日本对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寻求同日本的这种国际责任意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将经济实力表现为政治地位和“软”实力因而也就成为日本谋求新的国际身份努力中的基本逻辑。

第二是对美国的战略思维问题。在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思维体系中，对美国的战略思维占据首要的位置，是日本亚洲外交思维与行动的首要考虑因素。由于亚洲国家权力关系的深刻而迅速的变革，同时也由于日本战后的国际雄心并没有充分实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巩固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凸显出更加重要的意义。维持日美之间这种紧密战略同盟的一致性、协调性和长期性是日本外交战略，尤其是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和考虑

因素。日本的亚洲战略思维首要地决定于日本的美国战略，两者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离的。在多年以来一直寻求建立紧密的日美战略同盟之后，现在和以后日本的领导人不会将这种外交导向进行实质性的改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准备“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就此而失去动量。在巩固同美国更加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日本也会更加努力地建立更加坚实的“重返亚洲”的外交基础。伴随国家身份的复兴，这种日本外交在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同时夯实与巩固会大大地提高日本亚洲外交的自信心，同时使日本外交减少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和理想化的和平主义两个情结。正是这两个极端化的情结对 20 世纪日本外交思维与行动形成了强烈的困扰。

第三是现在的亚洲外交地理范围已经与原来大不一样，要比原来扩大了很多，而且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和复杂了很多。在整个 1990 年代，日本并没有将印度列为大国在亚洲权利平衡框架中的主体，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同印度一道，成为东亚高峰会议的新近被邀请的成员国，同时这些国家也都加入了 ASEAN+3 的机制当中。东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日本的亚洲外交视野当中。东南亚的确是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但是日本亚洲外交最具有挑战性的区域在东北亚。由于亚洲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地理分布的离散性，亚洲并不是一个总体和一体性的概念，日本亚洲外交也难以一个焦点地制定和处理其亚洲外交的思维与行动。而从问题和挑战的角度来看，东北亚地区构成了日本的亚洲利益的核心性关切区域，因而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构想和实施首先就是日本的东北亚外交战略的构想和实施。

或许有人认为日本外交在以上三个导向上的成功可以被解读为是一种地缘外交之间的均衡化的权衡。而实际上，这种均衡化的权衡并不是一种零和的游戏。事实是，日本的东北亚外交的确在日本的亚洲总体外交当中具有核心性的无可替代的牵动作用。将尚未解决完毕的国家身份讨论问题转移为修正式的合理化并不能够澄清关键性的历史身份问题，而这个历史身份问题是以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行为为核心内容而出现和被认识的。美国是否要使日本与东北亚“分离”，这种“分离”是否影响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实际上也都是很难确定的事情。而且，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比如东南亚地区，日本现在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同亚洲新近崛起的国家在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合作和竞争。从亚洲外交天然的离散性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在重要性方面可以取代东北亚。因而，即使日本在东北亚以外的亚洲外交取得了理想的成就，但是在东北亚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就不能说日本的亚洲外交是成功的。东北亚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和成败决定性的地区。

从日本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亚洲战略思维，当代日本的亚洲外交可以被划分成四个不同的时期，有的时期比较成功，有的时期就不那么成功。在 1980 年代，尤其是在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时代，日本的亚洲外交是比较成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后期由于过分的固执、因循和自信，日本的亚洲外交在成功程度上不如前期。在 1990 年代前半期，由于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缺失，日本的亚洲政策的成功程度就更低了。而 1990 年代后半期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日本外交务实调整的时期，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社会已经从战略思维的



层面理性充分地意识和认识到了日本外交在亚洲所面临的深刻困难和严峻挑战。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日本亚洲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公然的自我坚守（defiantly assertiveness）”。在应对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挑战方面，日本社会对于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这种亚洲外交立场和政策还没有形成一致性的评论。

从战后到 1980 年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内，日本的外交行为一直是在极为低调的状态下展开和进行的。在这种实际上的国家非正常化的状态中，构想和实施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外交战略，包括亚洲外交战略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几乎是不可行的。而自从进入 1980 年代之后，日本的政治精英和民众几乎同时觉醒和感到国家正常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种国家正常化的政治诉求的过程中，独立的外交战略问题就日益地提到了议事日程，成为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关切。这种外交战略正常化的意识基本上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第一，改变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是日本战后的占领者和安全保护者。与美国关系的改变和改善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首要内容，也是日本外交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寻求适当平衡点的基本内容。第二，加强和巩固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影响。东北亚地区是日本外交活动的传统地理后院，1945 年战败的时候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以非常羞辱的方式被驱逐。妥善地解决历史问题，同东北亚国家修好和解，建立正常的邦交关系并不断地改善这种关系，是日本外交，尤其是日本的亚洲外交的一个焦点所在。第三，恢复日本国民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自豪感；以正常的民族主义来打破原来存在的左翼与右翼之间关于国家身份的认同冲突和僵局。对这三个目标维度的积极努力在日本社会已经日益形成共识，因为这三个目标和维度构成

了日本外交思维与行动的基本导向。不过，日本的外交战略并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在这三个目标维度上的作为，还应该包括在这三个目标维度之间的相互平衡与影响，以使这种三维导向的外交战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要求根据具体的情况设定首选目标，避免和解决这三个目标维度之间可能出现的不一致，并且根据实际外交资源的具体情况实施具体的一体化外交战略。

在 1970 年代，日本的亚洲外交是以东南亚为焦点而展开的，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日本还将继续将这个地区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焦点，深化和巩固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以历史和解为主调的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不在东南亚，而在东北亚。在 1970 年代后期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之后，日本的东北亚外交基本上从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是利用所谓的苏联威胁来提升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重要性；第二是通过谋求与东北亚国家邦交正常化的方式来重塑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作用与角色。中国恰在这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日本通过官方开发援助（ODA）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等方式迅速地改变和改善了日中关系。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韩国的联盟关系内在地预示着日本与韩国之间关系改善的必然性；与韩国改善关系能够使日本外交获得在亚洲大陆最重要的滩头堡，或者门户。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持续提高，苏联经济的持续停滞，中国国内发生的改革开放进程，以及韩国产业经济发展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日本产业经济体系的深化依赖，都成为日本外交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北亚各国（主要是苏联、中国和韩国）都出现巨大变革的历史趋势，因而东北亚地区也就成为了一个被认定是处于重大变革状态中的地区。日本的外交战略试图以一种总体

的方式，考虑这一地区中各个国家的具体变化情况，改善同这一地区相关国家的关系，并在这种外交进程中实现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利益和影响。事实表明，在这一时期，日本在改善同东北亚主要国家的关系方面，成功地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日本的亚洲外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 1980 年代。

第二节 1980 年代的日本亚洲外交

从国际经济相对实力时间分布的角度看，1980 年代是日本经济实力的登顶时期。日本成功地克服了 19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并且成为了 G-7 成员国。在整个 1980 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也形成了 1980 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运行的“泡沫”。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登顶增长同苏联国内政治进程的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在时间上巧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新思维”直接地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凸显了日本在西方阵营中显而易见的经济影响权重。在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日本的热望是：利用其强大的国际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影响，积极地谋求相应的国际政治权力和国际政治影响，进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加负责和更加积极的角色；这也是日本外交在这一时期的行进逻辑，其核心是依托经济大国的地位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而实际上，日本的这种外交努力受到了主要来自冷战遗产的外部约束和依然悬而未决的“战后综合症”两个方面的限制。日本的外交努力因而还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外交展露出了战后以来一直没有或缺乏的两个重要的新特征：更加积极和更加自主。作为